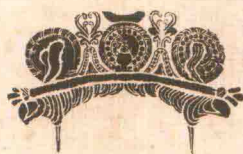




兰州大学 文库

A 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
赵梅春 屈直敏 主编



中国史学史研究丛书

中国史学史论丛

张孟伦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二十世纪通俗史学研究”
(编号10YJC770127)研究成果



兰州大学 文库

A 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所

赵梅春 屈直敏 主编



中国史学史研究丛书

中国史学史论丛

张孟伦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史论丛 / 张孟伦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5. 1

(中国史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11-04393-3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史学史—中国—文集
IV. ①K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0999号

策划编辑 王永强

责任编辑 张宏发 刘爱华

封面设计 郇海

书 名 中国史学史论丛

作 者 张孟伦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甘肃澳翔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76千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393-3

定 价 62.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前言

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资格。”“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并就如何研究与撰写中国史学史提出了具体的、系统的意见，指出史官、史家、史学之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是中国史学史应特别注意的内容。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姚名达、何炳松、周谷城、蒙文通、姚从吾、卫聚贤、郑鹤声、陆懋德、傅振伦、魏应麒、王玉璋、朱谦之、金毓黻、白寿彝等学者都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从而使中国史学史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专史。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了魏应麒《中国史学史》、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等著作。其中，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被学者誉为中国史学史学科草创时期的代表著作。对此书，白寿彝曾评价道：“金毓黻的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66 页）这一评价也反映了草创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述的特点。

20 世纪 60 年代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将史学史列入文科教材之一。配合教材的编写，史学界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学科建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探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目的、分期，以及中国史学史教材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方面。经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开始脱离梁启超设计的蓝图，关注历史理论、史学思想、史学发展规律、史学与时代等问题。这一研究风格的变化对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有不少高校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张孟伦先生也在兰州、

兰州大学文库

大学历史系开设此课,并从事相关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1978年一些高校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张孟伦先生被批准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年逾古稀的张先生再次焕发出学术青春,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论丛》(兰州大学历史系印行)、《中国史学史》(上下册)等著作,发表了多篇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论文,培养了10余名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第一届全国史学史座谈会,旨在交流学术,切磋问题,促进史学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此时张先生已年届八旬,应邀赴京,与白寿彝、陈千钧、张芝联、郭圣铭、高国抗等著名学者共同商讨史学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张先生提出的研究生要读经书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共鸣。张孟伦先生去世之后,由汪受宽先生继续主持硕士点的工作。经过张孟伦先生、汪受宽先生两代学者的努力,兰州大学的史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现有从事史学史研究的教师多人,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四库学,以及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

本丛书收录了张孟伦《中国史学史论丛》、汪受宽《史学史论文自选集》和《历史学基础》,以及朱慈恩《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四部著作,是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点三代学人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重要成果的一次阶段性汇集。《中国史学史论丛》在20世纪80年代兰州大学历史系印行的《中国史学史论丛》的基础上,增加了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若干篇论文,为张孟伦先生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的结集,反映了其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中的创建与成就。张先生治学贵自得之学,独到之见,这部论文集体现了这一治学特点,其中关于孔子史学、《左传》、《汉书》、《三国志》裴注、隋代史学、唐代史学、《史通》、宋代国史撰述、《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日知录》、王夫之史论、《廿二史札记》、章学诚史学等诸多论说,资料丰富,观点独特。汪受宽先生从事史学研究30余年,在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西北地方史等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史学史论文自选集》是其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之荟萃。汪受宽先生在从事史学研究的同时,还关注史学人才的培养。其在总结自己治史经验并吸收学界有关成果基础上所撰写的《历史学基础》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史学研究与论文撰写的规律、技巧与方法,为史学新人进入史学殿堂之指南、门径。求真正是史学的学术品格,致用则是史学的社会要求,历史知识的普及是史学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途径。朱慈恩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对20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并对其基本特征、主要功能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还选择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进行个案研究,全面分

析其编撰特征、流通传播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反映了中国史学史在脱离史部目录解题后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对当前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有着诸多的借鉴和启示。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促进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点史学史研究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赵梅春

2015年1月4日于兰州大学一分部陋室

目 录

张孟伦先生的史学成就与治学特点(代序)	赵梅春(1)
孔子和中国古代史学	(14)
《左传》的作者问题	(29)
《左传选》注释管见	(45)
《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	(58)
点校本《汉书》管见	(63)
裴松之《三国志注》	(75)
隋代史学	(82)
关于唐代撰修史书上的几个问题	(89)
刘知几《史通》评	(112)
评刘知几对《三国志》的评论	(139)
宋代统治阶级在撰修国史上的斗争	(143)
关于宋代重修《唐书》的问题	(169)
从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的两方面介绍《资治通鉴》	(180)
李焘和《续资治通鉴长编》	(198)
马端临和《文献通考》	(205)
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人民性的问题——与白寿彝先生商榷	(212)
《辽史》的纂修及其评价	(233)

兰州大学文库

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四权”史观	(239)
王夫之的史论	(251)
赵翼《廿二史札记》中为清政权服务的论点	(259)
章学诚的史学	(265)
评嵇文甫老先生两本评价历史问题的著作	(277)
谈谈整理古籍	(291)
杂记小说是撰修史书所必需的重要资料	(302)

附录一、序跋

《宋代兴亡史·序》	张孟伦(311)
《中国史学史论丛·前言》	张孟伦(313)
《中国史学史·序》	张孟伦(314)
《汉魏饮食考·序》	张孟伦(315)
《汉魏人名考·序》	王星拱(319)
《汉魏人名考·序》	王 易(321)
《魏人名考·后记》	张孟伦(322)

附录二、评议

评张孟伦先生著《中国史学史》	朱仲云(323)
史学史园地的一朵奇葩——喜读《中国史学史》(上)	汪受宽(327)

张孟伦先生的史学成就与治学特点

赵梅春

张孟伦先生(1905—1988年),江西万年县人。193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受业于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雷海宗、朱东润等。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江西萍乡中学、省立樟树中学、国立十三中学、中正大学、南昌大学任教。1950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投身建设大西北事业,从江西南昌来到地处西北、条件艰苦的兰州大学任教授。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随即被调往条件更为艰苦的张掖师专。1962年,由时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李天祐先生请回兰大从事教学工作。“文革”期间,先生遭受批斗,历经磨难。“文革”结束后,先生的生活得到妥善的安置,再度焕发出学术青春。1978年被批准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从此积极从事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与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先后开出中国史学史等四五门研究生课程,为兰州大学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殚精竭虑。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第一届全国史学史座谈会,旨在交流学术,切磋问题,促进史学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此时先生已年届八旬应邀赴京,与白寿彝、陈千钧、张芝联、郭圣铭、高国抗等著名学者共同商讨史学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先生提出的研究生要读经书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共鸣。今天当我们回望兰州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时,深为先生为学科建设做出的艰辛努力而感动。

先生任教樟树中学时,就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中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古代饮食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撰有《汉魏饮食考》《汉魏人名考》两部专著。在抗日战争与内战时期动荡不安的岁月中,先生坚持学术研究,撰写了《宋代兴亡史》一书,“以明一代之成败安危存亡之理”,借古喻今,抒发书生报国情怀。到兰州大学任教后,先生主要担任中国古代史、秦汉史、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等课程的教学,学术研究的范围也从社会史、饮食文、

化史、宋史扩展到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等领域,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论丛》《中国史学史》(上、下)等著作。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生涯中,先生凭借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史学功底,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在社会文化史、宋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从探讨古代的饮食文化开始的,1937年发表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上的论文为《豆豉考略》,1940年2月又在《中南日报》上连载《于定国饮酒数石不乱考》一文。《汉魏饮食考》一书,则是先生研究饮食文化的代表作。此书是20世纪30年代先生任教樟树中学时所撰写的,半个世纪后,经整理修订由兰州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此书通过仔细爬梳散见于各种史籍中的有关资料,旁征博引,详细地阐述了汉魏间各种饭食、饼饵的用途、制作原料与方法;猪、牛、羊、狗、兔、鹿、鸡、鹅等各种肉类食品的产区、烹调方法、用途;各种鱼类的养殖及鱼类食品的制作方法;蔬菜的种类及其功用;酱、豆豉等调味品在汉魏饮食中的地位、酿造方法;姜、椒、蒜、葱等调味品的产地、性能;酒的创制、功用、酿造技术、原料、种类;茶的起源与制作方法;栗、枣、梨、桃、李、梅、柰、橘、瓜、甘蔗等各种果品的产区、功用、质量、吃法。虽然只有15万余字,内容却十分丰富,涉及到汉魏饮食问题的方方面面,是了解汉魏饮食文化,乃至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参考书。

本书还注意考察与饮食有关的经济、制度、习俗,尤其是其中所记载的典故、逸闻轶事,读起来饶有兴味。例如,在叙述饼的种类、制作时,特意讨论了“卖饼者”这一称号,说明在汉代重农轻商的政策下,商人尤其是做小买卖者地位低下,卖饼者被视为无赖、小人的代名词。故凡社会地位低下,被人看不起的人,便被骂为“卖饼家”。从而喜好《左传》,不好《公羊传》的钟繇,“谓《公羊》为卖饼家。”^①说到蔬菜时,则指出汉魏时期有些人以种菜为名却别有用心。如刘备种菜旨在避祸。吴将陆逊在曹魏大军压境之时催人种菜,意在示人从容闲暇以退敌兵。而汉献帝时李孚种植薤不为食用,而“欲以成计。有从索者,亦不与一,茎亦不自食。”^②这些人名为种菜,实则另有所图。汉魏时期以蔬菜为食者多是平民百姓,达官贵人之饮食则是美味佳肴,而以蔬菜为恶食。倘若食之,则常为人耻笑。因而

^①张孟伦:《汉魏饮食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第33页。

^②张孟伦:《汉魏饮食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第88页。

甘于蔬食,就成为文人、官吏情趣高尚、清正廉明的象征。如汉明帝时临淮太守朱晖离职后,“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乡党讥其介。”^①而朱穆为官几十年,布衣蔬食,两袖清风,家无长物,公卿们请汉桓帝表彰他。汉魏时期的社会风气,在菜食方面可略见一斑。其述脍鱼之美,则兼及《世说新语》所载张翰故事。张翰在洛阳,见西风起,思念故乡吴郡菰菜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得适意,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因而辞官归家。读之令人垂涎向往。酒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酒文化。本书除了考证酒的起源、功用、种类、酿造方法,还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汉魏时期与酒有关的社会生活,如酒家、酒价、禁酒、榷酒、酒令、酒量、酒徒、酒狂、使酒骂坐、名士旷达嗜酒、沉湎于酒色的社会习气以及当时人与后代人对此的箴规、寄政于酒、备酒求学、借酒劝善等,不啻是一部汉魏酒文化简史。其论及酒家时指出,汉代有卖酒的专市,酒家门前往往高悬着酒星旗以招揽顾客,有美人或胡姬当垆,也有豪杰之士隐身酒肆为酒保的。卓文君当垆曾被传为千古美谈,汉初名将栾布穷困时曾卖佣于齐,为酒家保。赊酒之风在汉魏时,颇为盛行,亦有典衣卖马以换酒者,汉晋名士则嗜酒以示旷达。可以说,《汉魏饮食考》填补了饮食文化研究的空白,对发扬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魏晋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魏人名考》是先生另一部研究社会文化史的专著,也是早年任教于樟树中学时所撰写的,1988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此书在当时曾获江西省教育厅学术审议会奖金,时任南昌中正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王易先生和中正大学校长、著名学者王星拱曾为其作序。此书共十三章,对人名的起因及其与字的关系、汉魏时期命名取字的缘由,尤其是对汉魏时期以古朝代名、古圣先贤之名、天干地支、禽兽鱼虫、福禄寿喜等命名取字,以及改名换字的情形和原因、兄弟长幼排行、避讳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证研究。同时还对汉魏人名中常带有“阿”字这一特殊现象,以及汉代著名的隐者商山“四皓”的称号、姓名进行了讨论。其“第十二章同姓名”以表的形式列举出汉朝宗室同名者及同名者之关系,说明汉代纲常伦理、避讳制度并非如后世之严格,以致有父子、叔侄、兄弟,甚至祖孙同名者,并指出历代学者从名教观念出发认为《汉书》所记父子同名必有一误之说,是想当然的错误认识。本书涉及汉魏时期人名问题的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充实,是姓名学的一部力作。

值得注意的是,《汉魏人名考》对汉魏人命名取字、改名背后所反映的时代风尚、政治情状,所体现的社会心理诉求,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对中国人来

^①张孟伦:《汉魏饮食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第91页。

说,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称呼、符号,而且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寄托着命名取字者的意愿、期望,体现了其性情、信仰,包含着其对社会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命名取字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颇能折射出人间百态。本书正是透过汉魏时期命名取字之趋势,揭示出其社会风貌、时代特点。如指出,汉魏人喜欢以唐、虞、夏商周三代之名,古圣人尧、舜、禹之名,先贤如孔门弟子、管仲、子产、孟尝君、蔺相如等命名取字,反映了一种浓厚的慕古社会风气。而这种社会风气与汉代尊崇孔子,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尊孔子密切相关。孔子推崇古圣王贤能之人。随着孔子定于一尊,其地位与日俱增,“相应地,他崇古慕古的思想意识,也就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蔚然成风。在汉魏人的命名取字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①本书还通过对汉魏时期的人们多以福、禄、君、臣、公、卿、寿、延年、延寿、益寿、千秋、万岁等命名取字这一习俗的考察,指出汉魏时期普遍存在着一种期望吉祥万福,希冀高官厚禄、延年益寿的社会心理。嫖、嫪、开明、合欢、娥等字,含有邪淫、轻佻之意。如嫖是邪淫狎妓之意,嫪为淫嫪之意,开明、合欢有狎嫪褻渎之意。而貌美轻佻为娥。然两汉时期女子却多以此取名,如汉文帝长公主名嫖,外戚梁竦的女儿名嫪,东平王之婢名合欢,王莽的侍者名开明,名娥者则更多。书中指出,这种以妖冶之字为女子命名的现象,是汉代淫逸社会风气的反映。“秦代统治天下,防民正俗,严禁淫佚,男女一律(《史记·始皇纪》);汉则不然。‘其时宫廷淫逸之习,固已毫无忌讳。《东方朔传》谓自董偃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盖上行下效,势所必至’(《廿二史札记·汉公主不讳私夫》)。而女子命名,也都海奸海淫,充满了邪妖娇娆的意味。”^②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女子以妖艳之字命名,习以为常。这种对汉魏时期命名取字所包含的丰富社会内容的探究,使本书脱离了单纯的人名考证,进而从日常生活层面深刻地揭示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诚如评论者所指出的:“《汉魏人名考》主要是考证,但又不仅限于考证,它也注重‘义理’;它论述的主题是人名,但又不仅限于人名,它还论述了其他内容。作者说:本书‘说来虽是人名考,实际上却是上及政治,下涉社会,包罗万象’(第二章),这不属自夸;序者说:本书‘探究人名,而隐蹟所及,上自政制,下至风尚,莫不囊括包举’,这并非溢美。”^③因而《汉魏人名考》不仅是一部文化史研究专著,也是一部研究汉魏史的重要著作。

20世纪初,在梁启超“史学革命”的倡导下,史学界形成了一股新史学思潮。批判“君史”,撰写“民史”,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夫所贵夫史者,贵

①张孟伦:《汉魏人名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第18页。

②张孟伦:《汉魏人名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第68页。

③张兴杰:《汉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张孟伦〈汉魏人名考〉评介》,《兰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叙一群人所以休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焉。”^①与国家、社会、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术、风俗、艺术、婚姻、民族、交通等文化史、社会史,受到学者的重视。先生所撰《汉魏人名考》《汉魏饮食考》,是新史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这一思潮的积极回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日益被简化为阶级斗争史。为了改变这种局面,80年代的史学研究者积极倡导文化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复兴。1987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评论员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将复兴和加强社会史的研究作为开拓史学领域、改革史学研究的契机。此后,社会史的研究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重心之一。《汉魏人名考》《汉魏饮食考》的出版适逢其时,无疑有助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发展。

二、宋史研究

先生有关宋史研究的成果主要反映在《宋代兴亡史》(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此书分宋代开国、宋治兴盛、宋治衰亡三章,着重探讨了赵宋王朝建国之由及其兴衰盛亡之故。其中,对赵宋王朝内部的政治纠纷与外部的民族矛盾的分析,深入且独到,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先生探讨宋代之兴亡,特别重视社会风俗、教育、人才培养、士人风操等因素的影响。先生指出,重视人才、讲求气节和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宋代兴隆之根本所在。宋代对待人才,朝廷精于遴选,人主慎于接待,大臣乐于延誉,故而人才辈出,国家日盛。自太祖尊崇节义、敦励名实、褒奖韩通,范仲淹厉风节,胡瑗、孙复明正学,欧阳修等倡直言于朝,宋代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士存正气,以名节、廉耻相砥砺。国家危难之时,忠义蜂起。尤其是程门弟子,以国事为己任,忠君忧国,为反抗恶势力的领袖,抗击外族入侵的急先锋。在这种风气之下,人民亦怀抱忠义,既有誓志恢复国土的义士,亦有义愤起兵除奸之匹夫,故宋朝能危而复安。

至于宋代之衰亡,则主要缘于姑息苟安、内部纷争不断,以及在处理敌对国家问题上的软弱无能。先生指出,宋以文立国,其君贤者则仁慈,柔懦者则姑息苟安,优柔守文则有余,拨乱反正则不足,英达奋发之君,不可多得。其臣莫不墨守成规,不达权变,求其果毅驰骋之士,亦不易见。朝廷上下不思进取,暮气

^①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第3页。

沉沉。这种因循苟且之风,表现为在内安土重迁、姑息弛刑,对外则是偷安苟幸,不图远略。北宋立都于无险可据的开封,南宋苟安于偏于一隅之杭州,高唱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的陈腐论调,苟且偷安而不愿迁都以应敌。太祖曾欲留洛阳,最终都长安,终为大臣所阻扰。南渡后张浚建议都建康(南京),以为建康可以北望中原,使人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杭州)僻于一隅,内则易生安逸,外则不足号召远近。又有人倡议立都于建业(武昌)。皆不为一意求和的宋高宗所采纳。孝宗时,陈亮又建议迁都建业,孝宗欲用之,亦为大臣所阻。先生指出,都城有关一代盛衰,其自然形势实与政治人文相表里。宋若不是苟安,以洛阳为都城,则中原不至于沦陷。若都关中,则金兵南来,犹有形势可据,不像汴(开封)之一无所倚,致敌长驱直入。而南宋以临安为都城,僻处海隅,更加苟安而无恢复中原之志。宋朝不诛违命败军之将,不斩祸国殃民之奸人,甚至赏罚倒置。先生认为,不能明典正刑,无国法纪律,姑息违命败军之将,则将领难以统帅,无望将士出兵御敌。姑息像张邦昌那样的僭叛之人,无以激励天下以图恢复。保全、褒奖黄潜善、汪伯彦、秦桧、贾似道那样的奸臣,则丧失民心。

宋人好意气用事,以疾忌排挤为能事。不仅小人陷害君子,君子之间亦相互倾轧。真宗时,王钦若、丁谓嫉恨排挤守正疾恶的宰相寇准,使之一贬再贬。宁宗时,韩侂胄引用群小,排挤贤者,斥朱子之学为伪学。理宗时,权臣史弥远的亲信陷害程朱学者魏了翁、真德秀。宋末当权的贾似道更是嫉贤妒能,必陷之而后快。所谓君子也以议论攻击为尽职,好持高论,不肯舍己从人。一遇不合,就动气相攻,攻之不已,就罢官而去,不以国事为意。王安石变法,援引面谀之人,硕德重望被罢斥。而元老重臣也不肯考察新法之恰当与否,一切指为不善。元祐年间司马光秉政,彻底罢去新法,排斥新党。不久吕夏卿执政,元祐党人被斥。徽宗时立党人碑,称之为奸党。新旧党人相互意气用事,纷争不已,直至北宋灭亡。司马光、欧阳修、吕海、范纯仁、吕大防等皆是正人君子,却因议论不合,势同水火。胡瑗与孙复争名,遂不相见。范镇攻击陈执中,以为其无学术,非宰相之器。苏轼与程颐门人相互攻击,遂成洛、蜀、朔三党。张浚与赵鼎同时为相,偶以意见不合,就反目。张浚因岳飞与己意相忤,遂不复相容。先生对宋人热衷于内讧这种做派进行了详尽的揭露,并沉痛地指出宋代就是在这样的内耗中日益衰亡的。“宋之名臣,往往如此,国家又几何不衰而且灭也。”^①

在对外问题上,宋朝只知一味地退缩,纳币割地以求苟安。在处理与辽朝关系上,谨守修德以来远人之陈说,武备松弛。大臣多以弭战息民、修好为言。

^①张孟伦:《宋代兴亡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二版,第100页。

太祖时议伐北汉而取幽燕为赵普所阻,太宗欲亲征幽州,亦为大臣所阻。岐沟之战后,像曹彬那样的良将,也苟安言和了。檀渊之盟后,辽人步步逼进,宋则以增纳岁币、割地求苟安。对此,先生不禁悲愤地责问道:“何宋代之苟且优柔,畏惮契丹之至于此也。”^①对待西夏,则企图以爵禄予以羁縻,以恩惠予以笼络。举措失当,坐失良机,养痍遗患。至元昊时,西夏势力强大,宋疲于应付。对此,先生叹息道:“何宋代君臣之一味优柔仁懦,力行姑息而无远略也。”^②在对待金与蒙古的问题上,宋人亦复如此。金人第一次南下时,以割地求得苟且,朝廷上下弹冠相庆,不知防范。当金人再次南下,唯有惶恐,不知计之所出,而归罪于抗敌将领李纲,自坏长城。南渡后,高宗以秦桧用事,一意求和,迫害抗金志士,使岳飞抗金事业毁于一旦。孝宗曾锐意北伐,失败后,亦徂于苟安之习,不思进取。当蒙古南下时,当权的贾似道昧于攻战,只知享乐,割地求和以图苟延残喘。而在朝大臣则平日空谈心性,自命甚高,临危则逃遁。先生指出,正是这种以苟且偷安为上策的做法,导致宋代之衰亡。“辽人入寇,则增岁币;夏人讲和,则增岁币。至金师来犯,割地避敌;蒙古南下,称臣纳贡。故曰宋之衰亡,姑息苟幸之弊也!”^③

先生寄情宋代之兴亡,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藉宋人之杯酒,浇心中之块垒。中国自19世纪后期以来内忧外患,与宋代的情形颇为相似。先生探究宋代之兴亡,“以明一代之成败安危存亡之理”,旨在以史为鉴,对抗战建国有所裨益。

赵宋一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近年来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内藤湖南、陈寅恪等所提出的宋代近世说,也为学者所熟知。殊不知先生亦是此说的倡导者。先生指出:“昔人每言秦为中国史中之上古与中古之一大关键,愚尤以宋为近古与近代之一大关键。举凡中古之政治思想,社会伦理,风俗教化,莫不经赵宋廓而清之,矫而正之,而另示近代以规范,近代诚受其影响特深,而奉其一切为主臬者也。”^④认为赵宋一代是中国从古代转向近代之关键时代,要了解近代中国之思想、政治、风俗,须溯源于宋代。在先生看来,赵宋王朝虽富强声威不及秦汉隋唐,但其风俗文物之盛,道德仁义之风则超越汉唐,媲美三代。

20世纪上叶,从事宋史研究的虽有张荫麟、邓广铭、蒙文通、陈乐素、张家驹、聂崇岐等诸多学者,但先生的《宋代兴亡史》却是有关宋代历史较早的一部系统的断代史专著,筚路蓝缕,嘉惠后学。此书在海内外颇有影响,台湾商务印

①张孟伦:《宋代兴亡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二版,第74页。

②张孟伦:《宋代兴亡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二版,第76页。

③张孟伦:《宋代兴亡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二版,第72页。

④张孟伦:《宋代兴亡史·自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二版,第2页。

书馆曾多次予以重印,20世纪9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丛书》也将其收入其中。也正是这部著作奠定了先生在宋史研究领域的地位。

三、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文革”结束后,先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又一春天。在生命的最后10年(1978—1988年),整理、撰写了《中国史学史论丛》《中国史学史》(上、下)两部著作,发表了若干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对孔子、李焘、马端临、顾炎武、章学诚等史家,隋代史学、宋代重修《唐书》、宋代统治阶级在撰修国史上的斗争、《汉书·地理志》、小说的史料价值等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先生对所研究的史学问题,多有创见。即便有所偏颇,亦不失为一家之言。孔子是私人修史的开创者,其所删订的《尚书》、述作的《春秋》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生所撰写的《孔子与中国古代史学》(《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一文,纵览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旁征博引,从体裁体例、历史思想、史学观念、撰述方法等方面,详细地阐述了孔子的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并以司马迁撰《史记》、班固修《汉书》为例,说明中国古代史学是如何师承孔子史学的,从而使孔子为中国史学祖师一说落到实处。此文是研究孔子史学的代表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章学诚的史学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评价也愈来愈高。先生《章学诚的史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一文,辨析了章学诚对待考据的态度、所提出的“六经皆史”观点,还着重分析了其史学为清政权巩固统治服务的实质。在章学诚史学研究日益兴盛,章学诚学术地位日隆的今天,重读此文,不啻是一副清醒剂。在《宋代统治阶级在撰修国史上的斗争》(《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中,先生详细地阐述了宋太祖与太宗帝位之争、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人之争对宋代实录、起居注、时政记、国史撰修的影响,秦桧、韩侂胄、史嵩之、贾似道等权臣对史家的迫害,对史书的篡改,及其对修史活动的干扰、摧残。这是将史学发展置于一定的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揭示了政治斗争对史学的深刻影响,说明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史学发展的重要性。在《关于宋代重修〈唐书〉》(《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一文中,先生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探讨了宋代重修《唐书》的原因,以及宋代在重修《唐书》过程中所出现的纠纷,并对宋人所夸耀的《新唐书》的特点“其事增于前,其文省于旧”进行了辨析,指出这正是《新唐书》的缺点所在,其所增之事,多无根据,所省之文,则有关军国大事。其以文省事增为能事,则违背了当初重修

《唐书》的宗旨。在《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人民性的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一文中,先生对学者提出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具有人民性、民族正义感、敢于对现实作抗议的观点,进行了商榷。首先,提出了评价一部史学著作是否具有人民性、民族正义感的原则。先生指出:“评论一部历史著作是否具有人民性,有民族正义感,就得:第一,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一定的环境中去考虑。第二,必须从它本身的总的倾向性,全部的主要意旨去分析。”如果研究者不从作者所处的时代、其著作撰写的背景,不从其著作总的精神实质出发,所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其次,分析了马端临所处的时代及其对时代的回应、《文献通考》对史实的处理及其思想倾向,认为马端临的史学思想很难说具有人民性、民族正义感。先生指出,马端临身处国家民族危难之时,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反抗民族压迫斗争,却躲进书斋,逃避现实。宋亡后,又以元顺民自居,称宋为宋朝,不敢称国朝或我朝,并出任元的书院山长。这与胡三省以宋遗民自居,以文天祥守节伏死自励,在《通鉴》注中抒发民族爱国情感,且不许子孙仕元,截然不同。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本应写到宋亡,使宋朝一代典章制度首尾完整。但因害怕元代统治者的猜忌而影响自己的身家性命,却止于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不敢记载宋朝亡国痛史,更不敢歌颂民族斗争的悲壮事迹。与此同时,许多宋遗民所著之书与诗文,多忠愤激烈,黍离麦秀之悲,溢于言表,不顾祸患。马端临对南宋的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刘琦“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的评价,不合乎历史真实。在江南人民反抗民族压迫之时,马端临不歌颂岳飞等抗金英雄,以鼓舞人民的反抗斗争,反而不顾事实进行污蔑,这是他顺民心理的反映。因此,很难说马端临具有民族正义感、敢于对现实进行抗议。同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极力散布消极因素,如鼓吹遵循三年之丧的礼制、宣扬落后于时代的车战、要求在征战中讲求堂堂正正之举。在广大人民处于反侵略斗争的关键时刻,这些主张无疑是有害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否定、诋毁王安石变法,逐条指斥王安石所变之法。因此,很难说马端临史学思想具有人民性。

《中国史学史论丛》(1980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印行),是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论文集。《中国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986年出版),则是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心血的结晶,也是一部史学史研究力作,阐述了自先秦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繁荣至嬗变的历程,反映了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的系统认识,至今仍被研究者视为学习、研究中国史